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十二五”上海重点图书
城镇化与社会管理丛书



低生育社会的来临

——中国生育革命与政策抉择

○杨发祥 著



NLIC 2970693280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城镇化与社会管理丛书
“十二五”上海重点图书



低生育社会的来临

——中国生育革命与政策抉择

○杨发祥 著



NLIC 2970693280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低生育社会的来临——中国生育革命与政策抉择/杨发祥著.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3
(城镇化与社会管理丛书)
ISBN 978-7-5628-2988-1

I. ① 低… II. ① 杨… III. ① 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 C9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3478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十二五”上海重点图书
城镇化与社会管理丛书

低生育社会的来临

——中国生育革命与政策抉择
杨发祥 著

责任编辑/高虹

封面设计/戚亮轩

责任校对/李晔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址:上海市梅陇路130号,200237

电话:(021)64250306(营销部)

传真:(021)64252707

网址:press.ecust.edu.cn

印刷/常熟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3.75

字数/272千字

版次/2011年3月第1版

印次/2011年3月第1次

书号/ISBN 978-7-5628-2988-1/C·153

定价/4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出版社营销部调换。)

序

当今世界,各国人口规模、人口增长速度和生育文化不一,国情的多元导致各国生育政策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大体说来,生育政策可分为鼓励性生育政策和限制性生育政策。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激增和“人口爆炸”时代的来临,人口压力日益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国家开始在生育政策方面改弦更张。从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深受人口持续高增长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讨论和准备之后,毅然放弃鼓励人口增殖的传统政策,转而采取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新政策。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同样属于高生育率国家行列,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生育革命。据联合国不完全统计,20世纪70年代的158个国家或地区中,有65个国家或地区执行节制生育政策。到80年代末期,在178个国家或地区中,有近100个国家或地区执行节制生育政策,世界人口激增的脚步因而有所放慢。而到90年代初,在151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28个国家直接支持以节育为主的人口措施,17个国家间接支持节育。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或允许节育,并实施严格控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移民的政策。这些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大多出于现实的人口压力,以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正如美国学者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指出:“人口控制的真正要点——批评者时常忽略的要点——不是减少人口本身,而是减少生者的不幸。”^①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开始出现人口衰退现象。这种状况不断蔓延,引发了人们对“低生育率危机”或“低生育率陷阱”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1997年,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社会中。因人口锐减,俄罗斯拟征“无子女税”。1992年是中国人口转变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当年全国总和生育率首次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之后近20年来,几乎所有全国性人口调查统计均反映生育率处于1.5以下,城镇生育率甚至显著低于1.0。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很低生育率”的新时代,正如本书所称的“低生育社会的来临”。可以预见,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在并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将会出现短期难以扭转的负增长局面,即以平均每30年减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作为世界上

^① [美]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与人口禁忌》,戴星翼、张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56—357页。

第一人口大国,我国这种快速到来的人口变局,将会对劳动力、生产、消费、社会保障等方面造成重大影响,对未来的经济社会构成诸多挑战,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繁衍与发展。

中国生育革命的动力,最初来自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为世界少生了3亿人,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初步实现了由贫困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尽管这种以强硬控制手段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未获得国内外的一致认同,甚至批评多于褒扬,但它为全球人口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堪称世界人口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日本人口学家若林敬子曾指出:“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宏伟实验。如果这种尝试取得持续的效果,世界人口状况将会改变。”当然,中国生育革命的完成,有赖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释放出来的新的社会经济力量促进了生育率的下降,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育观念。制度与成本约束、推迟生育、不孕及竞争效应,都对我国生育革命的完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生育革命的完成,与中国进入“低生育社会”是同步的。在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的关键时刻,未雨绸缪,总结生育政策的历史流变与发展趋势,反思生育革命的实践历程与影响因素,研究低生育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对于科学预测人口发展趋势,保障中国人口安全,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聚焦生育率水平的研究较多,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生育革命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尚不多。而我国低生育率社会的来临,为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我国当前的生育政策与实践、论证及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判断找到了新的契合点,留下了大量可供探索的空间和可行的研究路径。杨发祥博士倾心撰写的本专著正是该领域的一部新作。总体看来,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以跨学科理论为视角,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将生育革命放置到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展开研究。在梳理生育革命思想渊源的基础上,从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及城乡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出发,从节育政策出笼与早期节育实践(1949—1970)、生育实践的秩序重建与结构性变迁(1971—1991)和计划生育的常态化与制度化(1992年至今)等三个维度,长时段立体呈现生育革命的现实进程及生育政策的时代抉择,探析了生育革命的发生机制。作者认为,生育革命的完成,使我国生育制度走过了从理论争鸣、政策调适到法制建构的发展历程,逐步完成了从节制生育向计划生育的话语转换,实现了从行政干预到政策牵引的方法蜕变,也初步实现了从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的体制转型。

第二,在对生育革命历时性研究的基础上,从共时性角度探索生育革命的协同机制,考量我国人口发展的不平衡和生育政策的差异化选择。作者认为,农村和少数民族生育政策的流变、流动人口的生育制度安排,以及涉军、涉外人员的生育规

定,体现了我国生育政策注重差异的灵活性实践策略,展现了中国生育革命的多维形态。中国生育革命的这种协同机制,使生育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呈现出不同的张力,也为未来新生育制度的建构培育了竞合的土壤。

第三,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生育革命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后果。本书以大国转型为视点,从社会关系与文化认知两大层面,探讨生育革命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将生育革命放置到社会转型中展开研究,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并重,探讨了生育革命的作用、地位与角色,探索生育革命与妇女、儿童、老人、家庭、文化及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生育革命是通过“急刹车”式的人口转变完成的。当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而言还比较年轻。中国生育革命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审视中国“低生育社会”的挑战时,充分考量本土的经验与潜在的变量,检视生育政策的得失利弊与未来走向,开展战略性预测与前瞻,探寻建构新生育制度的可能,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毋庸置疑,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在21世纪前期,我国还面临巨大的人口惯性增长,预计平均每年净增人口1000万左右,给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由于受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和生育率存在争议的影响,以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最新统计数据的尚未面世,本书的部分结论有待进一步展开。低生育社会的社会经济后果还有一些未充分凸显,或者尚初露端倪,有待今后作更深入的研究。总之,理解和正视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事实,是我们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与科学决策的一个基本前提。

杨发祥博士近年来在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喜人的成绩,作为他的博士后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相信,他的学术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郑杭生

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2011年2月18日

目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1
1.2 文献综述	4
1.3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15
1.4 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21
1.5 创新之处及若干限制	24
第 2 章 生育革命的思想渊源	27
2.1 中国古代生育思想	27
2.2 晚清至五四的生育思想	33
2.3 民国时期的生育思想	36
第 3 章 生育革命的酝酿：早期节育政策与实践（1949—1970）	47
3.1 节制生育的早期制度安排	47
3.2 早期节育实践的两度起落	59
第 4 章 生育革命的发生：生育政策的调适与博弈（1971—1991）	71
4.1 生育政策的阶段性流变	71
4.2 生育体制建设与秩序重建	81
4.3 生育实践的结构性变迁	92
第 5 章 生育革命的完成：低生育社会的来临（1992 年至今）	99
5.1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育制度	99
5.2 计划生育的依法行政	114
第 6 章 生育革命的协同：生育政策的差异化选择	122
6.1 农村生育政策的流变	122
6.2 少数民族生育政策的嬗变	131

6.3 生育政策的其他差别化规定	140
第7章 大国转身：生育革命的社会效应	147
7.1 生育革命与妇女	147
7.2 生育革命与儿童	154
7.3 生育革命与老人	159
7.4 生育革命与家庭	162
7.5 生育革命与文化	165
7.6 生育革命与可持续发展	170
第8章 结语：新生育制度的可能	177
8.1 生育政策的历史流变	177
8.2 生育革命的实践反思	184
8.3 生育制度的未来展望	187
参考文献	191
附录1 全国主要人口指标一览表（1949—2009）	198
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1
后记	207

第1章 / 导论

1.1 选题缘起 与研究意义

1.1.1 选题缘起

人口是一个内容复杂、具有多种社会关系的综合性社会实体。它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地域分布和密度、男女比例和年龄等特征。人口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一生下来,就生活在家庭关系、民族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社会关系中。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又具有不同的经济构成和职业构成。“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①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生育是人类一种本能的行为。生育行为是人类最基本的人口行为,生育行为的转变折射着整个社会的变迁。正如诺尔曼·雷迪尔(Norman Ryder)所言:“没有比当父母更关系个人一生未来的大事,没有比适当生育为社会生存更基本的行为模式。”^②恩格斯认为,社会生产本身包括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③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为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养成人。这一套活动我们称之为生育制度。”“生育制度的功能是完成社会新陈代谢作用的继替过程。在人寿有限、生死无常的变动中,一个人的生活却依赖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分工结构,所以社会不能不不断地预

① [德]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② [美] M·薄兹,[英] P·施普曼:《社会与生育》,张世文译,袁文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页。

③ [德]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备下新人物等着去接替旧人物死亡和退伍所发生的缺位。”^①可见，“‘种族需要绵续’是生育制度发生的基础”。人类就是这样在我们的地球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生育革命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从历史角度考察人类漫长的生存与发展过程，无疑会领略到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影响人们生育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差异。^② 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进程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以空前提高，物质文化生活得以进一步丰富，人类自身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从1900—1970年，世界人口由16亿迅速增至36亿，平均每年递增1.16%。1999年10月12日，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已达到60亿。1970—1999年，世界人口以平均每年1.78%的速度增长。^③ 人口的持续增加，使生物圈遭到难以承受的干扰和破坏，生态危机严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地球负荷越来越重，最终将达到难以支撑的程度。“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道德情感，并准备拿自己的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如果每一代人都只顾追求自己的最大享受，人类几乎就注定要灭亡。”^④ 在严峻的人口形势面前，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凸显，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下举世瞩目的全球性问题。“控制人口增长，是当前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紧迫任务，在决定人口增长的四个要素中，死亡、迁移和时间都不是我们能够有效控制的因素，或者根本无法控制，只有人口出生率这个因素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参数。研究如何用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出生率，来控制社会人口变化，使人口最终达到某种理想状态，是今后我们努力研究的课题。”^⑤ 科学研究并揭示人口变动的内在本质，有效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成为20世纪以来人类的重要课题，这正是生育革命发生的前提。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实行计划生育是生育制度的重大变革。面对人口控制的世纪课题，计划生育走向历史前台，并成为一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笔者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时值中央“71(51)号文件”发表(人们常习惯地称其为中国计划生育的新起点)，亲身感受了计划生育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对计划生育问题有许多原始的感性认识。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如火如荼，计生标语铺天盖地，笔者再次亲历了人口控制的严肃性与重要性，中国的生育革命正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完成的。本书选题的最初灵感，便是源自这种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中国人口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近20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已持续并大幅度低于人口维持再生产的更替水平。而人口生育水平降至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又恰恰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广泛纳入全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9、223页。

②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③ 查瑞传，胡伟略，翟振武：《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④ 王伟：《生存与发展——地球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⑤ 邓辛未：《中共计划生育的分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页。

全球化经济轨道同步发生的。在“一孩政策”开始执行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生育水平徘徊反复,并没有明显下降。这就说明我国近年来形成的低生育率,甚至部分地区的超低生育率是源于全球化经济压力以及全球化文化影响,而不是我国特有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①,这便是低生育社会研究的逻辑起点。

1.1.2 研究意义

生育革命的意义在于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而自主、自为地实现生育愿望。以中国生育革命为研究对象,探讨生育政策的历史流变,回顾生育革命的变迁轨迹,在经验层面对生育革命展开实践反思,对于归纳生育革命与人口转变的发生机制、检视生育政策的得失利弊、探寻新生育制度的可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对中国生育革命及其发生机制进行学理探讨,开展跨学科研究,对于促进人口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交叉,把握人口发展的自身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发展,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总称。^②作为人口学研究的重要范畴,生育革命是人口运行过程的重要环节。而生育是千千万万具有自由意志、持不同观念人们的行为,并受历史传统、思想意识、经济状况、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人口控制的决策,虽由国家和政府作出,但生育实践却必须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婚姻生育行为来实施和完成。从政策制定到生育率降低和人口得到控制,中间需要经过许多环节。其中还包含着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的转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每个环节都需要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③我国的生育革命就是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教育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进行的,经历了“三起”、“两落”、“继起”的发展过程,走的是一条曲折反复的道路。面对生育革命及人口转变进程中的鲜活经验和现实问题,我们有必要运用跨学科的资源,“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紧密结合实际,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研究问题,以实践中普遍存在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促进人口基础理论研究,以理论研究成果与社会经济发展客观需要来不断解放思想、更新人口控制思想、更新计划生育观念、改进方法、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增强发展潜力、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与人口增长控制能力。”^④

第二,在经验层面对中国生育革命开展实践反思,对于检视我国生育政策的得失利弊、科学预测人口转变的趋势、积极应对“后人口转变”引发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所受到的与日剧增的压力究竟来自何方?国际社会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这都是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人口数量的空前增

① 王丰:《低生育率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6月30日。

② 刘铮:《人口学词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③ 查瑞传,胡伟略,翟振武:《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④ 马瀛通:《人口控制辨析论》,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长、贫困的普遍和持续以及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造成的。由此可见,人类生存的危机来自人类自身行为,而人口则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①“人口问题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治、财经、军事、文教、房屋、社会、交通运输、医药卫生、环境污染、自然生态等,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其基本政策、法令规章的依据。”^②无论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还是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济困、改善人民生活、实行环境保护,无一不和生育革命紧密相连。中国的生育革命面向广大育龄群众,广泛作用于每一个家庭,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已使人们的婚姻观念、生育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生育革命的研究,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照,凸显“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开展对中国生育革命的政策回顾与实践反思,可以更好地把握生育革命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人口发展的战略性前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三,本书试以人口与社会管理等多学科理论为视角,探索生育革命的思想渊源,回应费孝通先生《生育制度》的基本要义与科学精神,从理论争鸣、政策调适和法制建构三个层面开展历时性研究,又直面当下开展共时性研究,全面探索了生育革命运作实践中的差异化管理、生育革命的社会效应与实践反思,为认识中国生育制度的长时段变迁,尤其是把握生育制度本身的发展规律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分析视角,并为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同时,开展对生育革命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可以科学规划国民生命周期中的重要事件,对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并带来人力资本的巨大效应,进而为国家的发展带来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研究主题深入触及当前中国社会制度体系中生育制度的本质,对于认识中国生育革命的政策流变与生育制度的转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也有着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1.2 文献综述

1.2.1 低生育社会研究

所谓低生育社会(society of low-fertility),是指生育水平较低的社会,通常指总和生育率(TFR)在更替水平(2.1)之下的社会。国外低生育理论主要有合理选择理论、风险回避理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和性别平等理论等。^③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的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

① 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1994年9月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

② 邓辛未:《中共计划生育的分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9页。

③ 胡伟略:《低生育理性预期理论及其政策意义》,《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2期。

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W. Lutz)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理论,它是在研究低生育率国家中政策对生育的“进度效应”(tempo effect)的作用时提出来的,主要用来解释为什么西方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持续降低并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难以回升的现象。^①该理论认为,总和生育率等于1.5是一个关键点,当总和生育率降到这一水平时,会引发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从而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即陷入低生育率陷阱。^②

生育率转变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刻的革命性变化之一。对生育率的关注与研究一直是中国人口研究的主体。可以说,中国的人口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生育率变动及其社会经济后果而展开和变化的。生育率模型,无论是数学模型还是统计模型,都对促进我国生育率研究,认识我国生育率转变过程、机制、决定因素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必将对中国人口转变理论的构建奠定基础。^③1992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当年为2.0)。1992年以后,统计部门便不再公布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在公布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年龄别生育率时,也不再顺便提供总和生育率,而以一般生育率代之。政府部门在谈到生育水平时,仅采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或“低生育率”这样一些模糊的表述。究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生育率水平有多高,一时完全没有了权威的说法,^④这使中国90年代以来的生育水平一直处于扑朔迷离的状况。于学军认为,官方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是在占有比较全面信息的基础上更务实的判断。^⑤夏乐平认为,90年代以来的历次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1.8的水平,这个数据虽然被机构和个人广泛引用,并得到多次重申,但缺乏根据。^⑥而所有实际应用调查和普查数据计算得到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都表明,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即使考虑一定程度的漏报而需要调整,仍用总和生育率为1.8(甚至以上)作为实际生育水平缺乏依据。总和生育率已经处于1.5以下的可能性很大。^⑦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报告的总和生育率为1.22的结果一公布就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连主持人口普查的国家统计局都认为

① Lutz, W. and V. Skirbekk. Policies Addressing the Tempo Effect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1(4): pp.699 - 720, 2005.

② 石人炳:《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实还是神话?》,《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陈卫:《中国生育率研究方法:30年回眸》,《人口学刊》2009年第3期。

④⑦ 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⑤ 于学军:《对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判断》,《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年第6期。

⑥ 夏乐平:《1979—2000年中国人口生育趋势:出生数据和教育数据的比较分析》,《人口研究》2005年第4期。

是“偏低”了,2003年又发布了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调整为1.4。^①这样,在认为常规人口统计数据不可信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目前我国生育水平的其他方法。其中一个被热衷支持的思路就是运用教育统计来估计生育水平,其理由是因为教育数据具有独立性,因而具有可靠性。从推算和估计的结果看,我国1991年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低于更替水平。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②但是,教育数据真的是估计生育水平的黄金标准吗?有学者对教育数据进行分析后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教育数据和其他统计数据一样,也存在质量问题。依据一个质量不高的教育统计数据去作出推算,即便假设与推算过程没有问题,其结果也是存在问题的。如果我们不加鉴别地简单用教育数据作为估计生育水平的“黄金标准”,必将得出错误的结论。^③然而,所有有关生育率的全国性调查或人口普查,以及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数据,都显示出生育率一致地、持续地下降,^④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妇女生育水平也同样处于下降的趋势,只是下降的幅度大小不同。生育水平下降幅度较小的地区多集中在西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少数民族多的省份,如四川、贵州、甘肃、宁夏、江西等地。这说明我国各地区的生育水平变动具有不一致性和多样性。^⑤因而,基本的共识是我国生育率已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究竟有多低并不十分确定。

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讨论之所以成为近年来人口研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对判断我国的人口态势着实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它应该成为中国制定生育政策的参考依据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既可以从90年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育意愿出现转变、生育年龄推迟、计划生育工作水平提高等角度来部分地加以解释,同时出生漏报也构成解释之一。胡伟略认为,对低生育的理性预期,我国先是从政府、国家、社会的角度开始的,逐渐向家庭、个人发展转变,形成生育的社会认同与家庭理性决策的结合。^⑥翟振武、陈卫认为,90年代我国一直没有公布总和生育率的数据,刚开始时沿用1990年普查的数据,后来一直使用总和生育率1.8,或用达到更替水平或低于更替水平的模糊说法。人们希

① 《人口研究》编辑部:《再论中国生育水平·主持人语》,《人口研究》2009年第4期;郭志刚:《认真做好当前生育水平的监测与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

② 翟振武,陈卫:《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

③ 蔡泳:《教育统计真的是估计生育水平的黄金标准吗?——对使用教育统计数据估计生育水平的探讨》,《人口研究》2009年第4期;陈友华:《教育统计数据估算生育率时存在的问题与低生育率后果》,《人口研究》2009年第4期。

④ 陈卫:《再论中国的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09年第4期。

⑤ 王金营,何云艳,王志成,段成荣:《中国省级200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评估》,《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⑥ 胡伟略:《低生育理性预期理论及其政策意义》,《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2期。

望 2000 年人口普查能为我们揭开 90 年代我国生育水平之谜。但是 2000 年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低得出乎意料,从普查的过程和结果看,使人们相信存在严重的漏报。^① 王金营认为,“五普”漏报人口的年龄分布状况与“四普”一样,漏报人口大都集中在 0~9 岁年龄组。女婴的漏报率远高于男婴。^② 陈友华认为,如果说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主要归因于计划生育因素的贡献,那么,在进入 90 年代后,计划生育对妇女生育率的影响就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则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力量,并成为主导生育率变化的决定因素。^③ 朱冬梅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在更替水平以下,这是我国长期实行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计划生育部门的管理机制等原因,要保持和稳定目前这种低生育水平,任务是艰巨的。^④ 王金营认为,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两个基本认识为:当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时——低生育率水平将是长期的。在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严格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生育水平将大幅度下降并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如果这样的低生育水平维持一个超长时期,必将形成惯性,最终将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致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大大低于更替水平,诸如日本、韩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均正在经历这样的痛苦。若生育意愿高于或等于更替水平——我们就有机会适当调整生育政策并严格执行政策,以使我国人口在较适当的时机实现稳定、持续的发展,我们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可能将会较少、较轻。^⑤ 梅志强认为,我国虽然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低增长率与高增长量将长期并存。低生育水平反弹的现实风险与新生代“低生育情怀”都应注意。^⑥ 从低生育社会已来临的事实考虑,2000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强调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1.2.2 生育革命研究

生育革命(Fertility Revolution)有两重含义:一种是从生物工程意义上进行的生命科学革命,另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历程及生育选择的发生机制。生命科学迭创奇迹。1790 年,人类第一例人工授精获得成功。1978 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国诞生。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是 1988 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完成的。促排卵技术、体外受精技术、胚胎培养

① 翟振武,陈卫:《1990 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人口研究》2007 年第 1 期。

② 王金营:《1990—2000 年中国生育模式变动及生育水平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03 年第 4 期。

③ 陈友华:《教育统计数据估算生育率时存在的问题与低生育率后果》,《人口研究》2009 年第 4 期。

④ 朱冬梅:《关于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分析》,《西北人口》2003 年第 3 期。

⑤ 王金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人口学刊》2009 年第 3 期。

⑥ 梅志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8 年第 4 期。

ICSI 技术、胚胎和卵子冷冻技术不断完善并应用于临床,给成千上万的不孕家庭带来了福音。^① 刘学礼在《生命科学的伦理困惑》一书中认为,我们在欢庆生命科学巨大成果的同时,也从伦理学角度听到了日益响亮的争论声。从试管婴儿开始,到多利羊、克隆人、基因隐私、基因资源……上至政府首脑,下至贫民百姓,都在为此忧心忡忡。究其原因,是因为生命科学的发展引发或可能引发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刘学礼从生育控制、缺陷新生儿处理、生殖技术、克隆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治疗、转基因食品、器官移植、医学实验、安乐死等十个方面,分析了人类面临的种种伦理道德困惑。^② 樊新民则在《生育革命:对基因工程时代选择生育的社会学探讨》一书中提出,生育是人类繁衍的方式,有人类以来一直没有特别的变化。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如基因组解密、克隆人、试管婴儿、避孕新技术的应用,引发了大量的社会、伦理、法律问题。人类生育由自然生育、计划生育发展到选择生育,使家庭、婚姻、生育行为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③ 本书中所讲的生育革命,主要指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口转变与生育选择及其意义。

人类的生育革命最早发生在 18 世纪中叶的法国等欧洲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生育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呈爆炸式的扩散。中国的生育革命在这个全球性的浪潮中独树一帜。对生育革命的研究,最初源自西方人口转变论(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人口转变,是同生育革命高度相关的一个概念,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各种人口现象处于相互联系的同一体系中,呈有规律地阶段性递进、转变的特征,它是指人口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转变。其主要观点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依照时序经历了从原始型、传统型到现代型的转变,它们分别以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三者的高高低、高低高和低低低为其人口学特征。^④ 1929 年,美国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汤姆逊(Warren Thompson)根据一些国家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历史资料,把世界各国人口增长变化水平区分成高、中、低三种类型。^⑤ 1934 年,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Adolphe Landry)进一步丰富了人口转变的内涵。^⑥ 1945 年,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 W. Notestein)在此基础上将这三种类型归纳为人口发展的三个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人口高增长潜伏期,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化增长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下降稳定期,并最先系统地论述了人口转变的条件、原因和理论,提出了“人口转变理论”^⑦,将人口转变确定为对人口发展一个特殊阶段的称谓。

① 王维华,孙青原:《生育革命:迎接试管婴儿新时代》,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序言。

② 刘学礼:《生命科学的伦理困惑》,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樊新民:《生育革命:对基因工程时代选择生育的社会学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 Donald Corgill. Transition Theory As General Population Theory. Social Force, Vol. 41, 270 - 274, 1963.

⑤ Thompson, W. S. Popul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 No. 6 May 1929, 959 - 975.

⑥ Landry, A. La Revolution Demographique, INED Press, 1982.

⑦ 谭晓青:《中国的生育革命》,《中国人口科学》1989 年第 4 期。

赵时亮认为,从人口统计指标来看,所有人口转变都是从稳定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逐步过渡到稳定的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这个共性显然可以作为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评判标准。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志应该是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达到并稳定在低水平之上,对于这个低水平到底有多低,各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总的说来应处于更替水平左右,但没有必要必须低于更替水平。^①李通屏、郭继远根据政策的实施强度,将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转变分为五个阶段:无生育政策制约的死亡率主导型人口转变(20世纪50年代),城市有规定、农村无政策背景下的人口转变(1963—1972),全面推行“晚、稀、少”生育政策背景下的人口转变(1973—1980年秋),生育政策向一孩紧缩并予以严厉实行阶段的人口转变(1980年秋—1992年),生育政策的稳定发展阶段(1993年以来)。^②王金营、杨磊认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的自然变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和一个特殊时期,基本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第一阶段:1949—1957年的人口转变阶段,即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阶段(特殊时期:1958—1962年上半年的低增长时期);第二阶段:1962—1972年是以生育率升高拉动的第二次高增长阶段;第三阶段:1972—1991年,该时期是生育率快速下降并进入调整的阶段;第四阶段:1992年之后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20世纪末开始生育水平一直稳定在1.6~1.8。^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死亡率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降到7%以下),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从而初步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王学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效,极大地缩短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使中国快速进入稳定、持续的低生育率水平时期,初步缓解了人口数量增长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④叶明德提出,低生育稳定期是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阶段。^⑤穆光宗指出,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口发展已达到了新的阶段,人口问题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增长型人口问题正在转变为结构型人口问题、环境型人口问题和政策型人口问题。成功的人口转变、持续的人口发展需要规避新的风险,消解旧的风险,促进家庭和社會的双安全。^⑥于学军认为,在计划生育的推动下,中国人口伴随着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度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

① 赵时亮:《中国的后人口转变及其特殊性》,《人口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李通屏、郭继远:《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政策的演变》,《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年第1期。

③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人口学刊》2010年第5期。

④ 王学义:《人口转变后果研究——西方视野、价值意义、主要缺陷与分析框架构建》,《人口学刊》2007年第5期。

⑤ 叶明德:《低生育稳定期: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阶段》,《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6期。

⑥ 穆光宗:《中国人口转变的风险前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